

中德学会(1931-1950)国内外研究状况述略*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 of Deutschland-Institut

何俊¹

Jun HE

中国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dasein@163.com

徐懿²

Yi XU

中国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2587859994@qq.com

摘要 作为中德两国在二战期间唯一的学术和文化交流中心，中德学会已经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有关这一机构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渐涌现出来。本文从“史”“传”“论”三个维度出发，对国内外有关中德学会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评价与之相关的研究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展望，指出在人物研究、出版物和藏书研究、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等方面还有待推进和扩展。

关键词 中德关系史；中德学会；研究现状

Abstract As the unique Sino-German academic and cultural center, Deutschland-Institut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attention, whereas the findings have emerged gradually since the 1980s. In light of the methodological "trinity" of "historiography", "biography" and "critical commen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esearch of Deutschland-Institut both in domestic as well as overseas academic circles, commenting on the research merits and demerits specifically. Based upon these considerations, it accentuates the research prospect of Deutschland-Institut, especially concerning studies of scholars, publications and book collectio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 between research and politics, for future advancement.

Key Words Histor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hip; Deutschland-Institut; Research Overview

按照初步划分的三段式汉学发展阶段来说，³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汉学研究都是肇始于

收稿日期：2023-07-17

作者简介：¹ 何俊，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² 徐懿，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 学界对中德学会的起止时间存在不同说法。开始年份有1931和1933两说，比如汉德对照版的1935年《北平中德学会会务概况》德文部分称“学会的雏形是郑寿麟在北平奠定的，最初称为‘德国研究会’”，中文部分又说“本会于1933年经郑受麟先生创立于北平”（参见中德学会（编）：《北平中德学会会务概况》，北平：中德学会出版社，1935年，德文、中文部分第1页）。笔者认为1931年创立的“德国研究会”的时期当属中德学会的前史，故把中德学会的初始时间界定为1931年。中德学会的终结年份也有1945和1950两说，这里取房建昌基于档案研究得出的1950年这一结论：1949年11月10日中德学会向上级机关递交了登记申请书，翌年4月11日得到不予登记的批复，所有图书资料移交北京图书馆（参见房建昌：《从北京的中德文化协会到中德学会》，载《德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43页）。

³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2页。

“游记汉学”，经由“传教士汉学”阶段而发展至“专业汉学”，即研究者为中国文化深深折服，并主动进行学术研究。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汉学研究也逐渐从非专业化走向专业化，从书斋学术走向关注现实、以区域国别学为导向的中国学研究。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德国的统一要比法、英、荷、西、意等国家晚得多，其汉学研究的发轫也晚于以上各国，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进入有组织的专业化阶段¹。不过德国学术界严密的逻辑体系、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其他学科精深的学术实力促进了该国汉学的迅速发展，使之逐渐后来居上，进入欧洲乃至世界汉学前列。

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审视德国汉学，可以断定的是，其发展离不开学术关系网络的构建和学术共同体的创立，而这一点又跟中国学者的参与、中德之间的学术往来和交流不无关系。在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征程中，就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汉学学术组织——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它屹立于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之中，为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也让德国的汉学研究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硝烟战火中传承和赓续。中德学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完整的研究计划、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专业机构²。根据中德学会1935年中德对照版会务报告的德文内容可知，学会是由郑寿麟在北平奠定雏形，最初称为“德国研究会”(Deutsche Studiengesellschaft)；1933年3月27日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4日重新建立学会；5月中旬学会有了“中德文化协会”(Chinesisch-deutsche Kulturvereinigung)这一名称，5月22日最终确定为现行的“中德学会”，以便与在南京已经存在的中德文化研究会区别开来。³在抗日战争的动荡局势中，因为德日同盟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德学会并未像多数在华学术机构一样被日本势力消灭，而是在复杂的境遇中得以留存和发展。在其不足二十载的短暂光阴中，学会中人员变动频繁，会员个人的际遇也因战乱频仍和时局纷扰时有变化；幸得一批中德学者的孜孜以求，学会为特殊时期的中德文化交流保存了不灭的希望之光。时至今日，这个组织已经逐渐从历史的尘烟和泛黄的档案中浮现出来，进入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本文将立足“史”“传”“论”三个维度，梳理和评述迄今国内外有关中德学会的研究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关研究展望。

一、“史”：历史类著述中的旁涉

在国内外出版的多部历史著述中都可以找到中德学会的身影，尽管它们只是从旁涉及而非专门论述，在此国外汉学家占了先机。美国学者柯伟林(William C. Kirby)1984年出版专著《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述及20世纪30年代中德文化组织的生长时提及中德学会⁴，强调它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某些细节并不

¹ 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8页。

² 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交流》，收入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

³ 中德学会(编)：《北平中德学会会务概况》，北平：中德学会出版社，1935年，第1-3页(德文部分)。

⁴ 参见：[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确切，违背了柯伟林声称的“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因此被中德学会后期的实际负责人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自传中批驳为“投机做法”¹：比如事实上学会没有受到帝国工业联合会的支持，既没有翻译也没有出版兴登堡自传《我的生活》，没有翻译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意志的凯旋》。²

法国汉学家克莱斯勒（Françoise Kreissler）的法语专著《19 世纪末至二战期间中国的德意志文化活动》1989 年在巴黎出版，她充分利用所能找到的一手资料以及与傅吾康多次的访谈结果，用十多页的篇幅述及了中德学会的成立历史、组织机构、所办期刊（《中德学志》《汉学集刊》），以及包括艺术展览、德文夜校、电影放映、论文比赛、汉学家下午茶聚会、古典音乐会等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³ 克莱斯勒认为，从放映电影的题材和内容来看，中德学会仍然部分扮演了第三帝国宣传者的角色，而所办刊物因受到纳粹当局资助而无法完全与其保持距离。不过总体上学会对纳粹官方采取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即尽可能避免沦为纳粹政权的宣传工具，但也从未公然反对这一政权，当然部分学会成员也拒绝公开表示支持。总之，学会尽可能地满足纳粹德国当局的需要，与此同时又把政治置于次要地位，把学会打造成一座研究高于一切的象牙塔。这一点从当时在北平的汉学家的研究重心也可窥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由此避免了有时令人不快的现实问题。克莱斯勒将学会活动置于 19 世纪末至二战期间德国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推广这一背景下考察，进一步彰显了“诗哲之国”在晚清以降的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留下的足迹和印记。

在傅吾康自传的汉译本出版之前，中国国内学界对中德学会所知甚少。张国刚 1994 年出版的《德国的汉学研究》曾在“留学北京的德国汉学家”一节对中德学会做过蜻蜓点水般的介绍，重申了学会在德国汉学家留学中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称学会是他们的“研究俱乐部”⁴，并援引傅吾康的评价来称赞学会的重要贡献，称它是“莱布尼茨在北京设立一个研究所的理想实践”⁵。沈福伟 2003 年的《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专辟一节介绍中德学会及其门户期刊《中德学志》⁶，其贡献也主要体现为资料整理。次年，田正平在《中外教育交流史》第十四章“中外教育交流机构及组织的创建与活动”专辟“中德学会与中德教育交流”一节叙述中德学会，涉及组织结构、运作与消亡、图书收集与出版、文化与教育交流活动等各个方面⁷，不过仍然拘囿于一般性的介绍和阐述。李兴业、王淼 2010 年的合著《中欧教育交流的发展》也花费了几页的篇幅阐述“中德学会与中德教育交流”⁸，并总结出学会对推进中德教育交流的几点贡献，遗憾的是依旧没有跳出一般论述的窠臼。

¹ [德] 傅吾康著，欧阳颺译：《为中国着述——一位汉学家的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68 页。

² Hu Chün-yin, “A Note on the Deutschland-Institut at Peking 1931-1945,” *Asien* 25 (1987): 99.

³ Françoise Kreissler.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9, pp. 184-195.

⁴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78 页。

⁵ 同上引，第 79 页。

⁶ 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933-941 页。

⁷ 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748-762 页。

⁸ 李兴业、王淼：《中欧教育交流的发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70-73 页。

二、“传”：学会中心人物的传记和研究

中德学会的相关研究在核心人物的自传或学界对某位中心成员的专门研究中也都可以找到踪影。作为学会后期的实际负责人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傅吾康陪伴学会走到了终点，其两卷本回忆录《为中国着迷》先后于1995和1999年付梓，合二为一的汉译本则于2013年出版，披露了大量与中德学会相关的史实。傅吾康在前言中写道：

这本自传最初受到了弗朗索丝·克莱斯勒(Françoise Kreissler)女士的《中国的德意志文化活动》(*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巴黎, 1989)一书的启发。该书第184页至195页讲述了北京的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 而本人曾于1937-1945年在那里工作过。克莱斯勒女士认真研究了现存的有关学会历史的资料并就此多次询问我, 不过, 由于资料的缺乏, 她的书中呈现出来的学会形象很不完整, 需要加以补充。中德学会的工作对我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 有鉴于此, 我对学会的情况进行了补充, 并形成了我的自传。¹

从傅吾康的夫子之道可见, 其自传写作的直接缘由正是他人对中德学会的相关研究, 而整部自传中的北平岁月正是围绕学会展开, 不啻一部扩充了的中德学会发展史。正是傅吾康揭开中德学会的神秘面纱, 而后来国内出现的相关研究大多源于这部作为一手史料的自传。

此前, 李雪涛2009年写过《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², 该文也可视为傅吾康的小传。傅吾康在华的漫长经历与中德学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且该文中的中德学会是以傅吾康的视角呈现的。此外, 论文还提到了傅吾康与中国学者及在华德国学者的学术和社会关系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说, 该文也可算作以中德学会中心人物为研究对象的成果, 不仅叙述了中德学会的成立和运行情况, 还兼及学会的丛书以及其他著作出版、门户期刊编辑、图书馆建设、在北平的汉学家圈子以及傅吾康在学会的学术网络体系这一背景下产出的汉学研究成果。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文末附有傅吾康1937-1950年的汉学论著目录以及中德学会出版的丛书和单行本一览表, 尤其是后者, 给学界提供了研究中德学会, 特别是其出版发行领域的重要资料。

中德学会的另一核心人物是德国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 他在中德学会中发挥的作用引起了德国学者墨柯(Peter Merker)的关注。《评霍福民1940-1945年在北京中德学会中的作用》一文收入马汉茂(Helmut Martin)和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1999年用德语出版、2005年被译成中文的论文集《德国汉学: 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⁴。墨柯的

¹ [德] 傅吾康著, 欧阳颉译: 《为中国着迷》, 前言第3页。

² 李雪涛: 《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 载《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4, 2009年, 第63-105页; 又收入《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年, 第154-207页。

³ 李雪涛: 《此心安处即吾乡》, 载《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 第163-179页。

⁴ Peter Merker, "Anmerkungen zum Wirken von Alfred Hoffmann am Deutschland-Institut in Peking, 1940-1945," In *Chinawissenschaften -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ed. Helmut Martin, & Christiane Hammer,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9, pp. 474-497.

论文当然并非为霍福民立传，但该文围绕这位中德学会中心人物展开，故而可以视为学会人物研究的组成部分。论文阐述了霍福民赴任中德学会的历史背景，并剖析了这位具有纳粹倾向、“在北平最受欢迎的负责官员之一”¹在中德学会从事的各项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墨柯认为，自己的研究意图并非揭示中德学会活动所受纳粹上台的影响，而是“为了再现一段处于政治和科学的复杂张力域中的德国汉学史，同时说明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行为方式”，这实乃客观公允、未失偏颇的看法。置身当时中、德、日三方互相争斗纠葛的复杂政治形势之中，又直面中德两大文化互相交织的压力，人的行为动机更不可能呈现单一的面相。因此，评判功过是非的依据也应该丰富而立体；但无论如何，那批德国汉学家（即便部分对纳粹持拥护态度）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容忽视和抹煞。

三、“论”：有关中德学会的专论和研究

尽管迄今国内外的中德学会研究远未出现高潮迭起的状况，但还是涌现出了一些专题论文。1996年，中国学者丁建弘和李霞利用一手资料，用德语合写论文《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交流》，载入德国汉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所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德关系研究》。论文首先简述了中德文化交流史和中德学会应运而生的背景；接着论述了中德学会作为中德学者首创的文化交流机构的重要地位，并通过分析学会的成立、宗旨、任务、组织和活动，论述了其纯学术性的特征；之后通过研究学会后期实际负责人傅吾康在学会的活动，再次强调学会在日伪统治期间的学术纯粹性；最后展现了学会的图书资料、总务和编译三项工作的成就，得出中德学会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结论。作为国人首篇以中德学会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尽管以外文书写，其首开先河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其中也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认为“中德学会是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²，这一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驳斥³，因为事实上后来受到纳粹政府资助的中德学会还是部分承担了纳粹宣传的任务；二是仅从傅吾康一人的活动来肯定学会的积极努力，没有将部分亲纳粹会员的学会活动囊括其中。此文后被译成中文，收入黄时鉴1998年主编的《东西交流论谭》一书。

德国学者詹森（Thomas Jansen）1999年撰有《对北京中德学会在1933-1945年间所从事工作的几点说明与质疑》，同样收入上文提及的论文集《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⁴。在詹森看来，直面纳粹控制的德国外交政策这一背景，中德学会并未完全保留纯粹的学术研究性质。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的中德外交关系、德日同盟关系和学会会员的活动，他进一步探讨了中德学会在1937-1945年间扮演的角色，认为学会并非是进行文化交流的纯

¹ [德] 墨柯著，李双志译：《评霍福民1940-1945年在北京中德学会中的作用》，收入[德] 马汉茂、[德] 汉雅娜、张西平、李雪涛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501页。

² Jianhong Ding & Xia Li, “‘Deutschland-Institut’ und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beziehungen,” In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Studien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ed. Mechthild Leutner, Münster: LIT, 1996, p. 313.

³ 参见[德] 托马斯·詹森著，刘梅译：《对北京中德学会在1933-1945年间所从事工作的几点说明与质疑》，收入《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183页；[德] 墨柯著，李双志译：《评霍福民1940-1945年在北京中德学会中的作用》，收入《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494-495页。

⁴ Thomas Jansen, “Einige Hinweise und Fragen zur Arbeit des Deutschland-Instituts in Peking 1933-1945,” In *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ed. Helmut Martin & Christiane Hammer,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9, pp. 185-201.

学术组织,但依然保留了较大的自主权,为中德交流做出了显著贡献。

房建昌在《德国研究》1999年第2期发表《从北京的中德文化协会到中德学会》,这也是国内首篇有关中德学会的专题论文。该文最大特色在于依托从各大场馆查阅的档案资料,对先前的研究成果进行补阙和匡谬,比如纠正了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有关学会的信息偏误。该文将中德学会的肇始界定为1933年3月27日,阐述学会的筹办、正式成立、创立目的和初期运行情况,以及1935年之后的状况,具有较高的信息和资料价值,且对既往研究有补遗斧正之功。但此文也不无疏误之处:一是忽略了中德学会的前身“德国研究会”,其创始人依然是郑寿麟,且中德学会确实是在德国研究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成形的,因而不应该抹去学会前身1931至1933年的历史;二是对1935年之后的学会状况仅一笔带过,对其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形势及参与其间的核心人物不置一词;三是将阐述重点放在了学会筹备背景上面,没有深入探究从中德文化协会发展到中德学会的缘由或契机。

利用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搜集的档案,崔文龙在2011年和次年相继发表《中德学会的成立及相关争论》和《中德学会与德国对华文化外交》两篇论文。《中德学会的成立及相关争论》披露了如下重要史实:来自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中国学院的鲁雅文(Erwin Rousselle)曾对学会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过质疑;德国外交部也曾在1933年9月26日致信德国驻北平领事馆,告知外交部在1933年9月1日的通告中专门对中德学会事务进行了探讨;而据档案馆资料显示,鲁雅文在质疑的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建议都被有力驳回。¹论文厘清了德国驻华外交人员参与中德学会成立的情况及围绕中德学会成立展开的相关争论,将这段隐藏在背后的历史挖掘出来,进一步丰富了中德学会的史料,展露出德国外交部曾对中德学会的积极态度。中德学会从一个私人创办的学术机构发展成为中德合作的学术机构,这跟德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参赞费舍尔(Martin Fischer)等外交官积极参与了学会的成立和共建,期望借此为德国文化在中国发挥影响奠定基础,从而获得长远的政治经济利益。相比之下,《中德学会与德国对华文化外交》更注重对史料背后隐藏的德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深层分析。此文阐述了德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复兴以及中德学会的成立与组织架构,接下来分析了陶德曼和费舍尔等德国外交人员为学会成立所作的贡献,包括向德国外交部建议资助学会的创始人郑寿麟,借此论述了德国推行对华文化外交的意向。在分析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该文得出结论:由于中德学会是德国政府支持的学术机构,同德国对华文化外交的推行紧密相连,并且纳粹上台后针对中德学会事务的控制加强,学会的人事安排和学术活动都受到审查和控制,保持中德学会的“纯学术性”不再可能;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特殊时期,学会仍然在傅吾康、杨宗翰等学会成员的努力下,为在华传播德国学术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²

目前国内唯一一篇研究中德学会的学位论文是河北大学赵慧芳2012年的历史学硕士论文。论文立足历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充分地利用留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

¹ 崔文龙:《中德学会的成立及相关争论》,《民国档案》2011年第3期,第90页。

² 崔文龙:《中德学会与德国对华文化外交》,《史林》2012年第6期,第177页。

馆的档案资料,包括学会年报、会务报告和期刊等珍贵的一手文献,由四大部分构成,涵盖中德学会的创办、学会的运行机制及发展历程、学会的主要活动以及学会创办出版的期刊等。在主体部分,该文将学会活动进行了分类,进一步挖掘出了学会出版与翻译活动之外的贡献,比如创办德文补习学校、设立了学会奖学金、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等,较为详细地呈现了学会的期刊,包括《研究与进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和《中德学志》(*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的创办和发展历史,兼及期刊的刊印形式和部分出版内容。论文从历史学视角出发,多维度、全方位、系统性地展现了中德学会为中德文化交流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努力。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撰写者德语知识欠缺,这让论文所用文献拘囿于学会留存在中国的档案材料以及前人的中文学术成果,尤其是未能利用傅吾康的德文原版回忆录《为中国着迷》(此书中文译本2013年出版)。此外,该文纯以宏观的视角呈现史实,缺乏微观角度的考量,比如对学会会员频繁更替,以及学会不同阶段的核心人物所发挥的作用完全没有提及。事实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机构的运行,必然离不开各方人士的勤勉努力和辛苦支持,尤其是在战乱年代尤为重要。学会的核心人物甚至可能影响学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举例来说,如果福克司(Walter Fuchs)而非傅吾康成为学会实际负责人,就极有可能引领学会走上不同的道路。

2013年,童欣发表了题为《中德学会是纳粹政府在华的宣传工具吗?——基于〈中德学志〉内容的分析》的论文,探讨了学会在纳粹政府上台后受到的政治影响。由于1936年后中德学会的资金完全由当时的纳粹德国政府提供,而协会在1937年之后已经处于日本占领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中德学会在1937年到1945年间的性质难免引人怀疑。作者从学会的门户期刊《中德学志》切入,以此探讨特殊时期学会是否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在她看来,尽管这几年间《中德学志》不可避免地受到德国纳粹政府和日本占领政权的影响,但该刊物还是保留了其纯学术性质。¹因为纳粹的影响有所起伏,加之政府内部并未将学会定义为政策宣传工具(此任务由当时位于上海的德国文化研究院承担),只是希望起到一定程度的宣传作用,此外还有杨丙辰、曾一新和王锦第等中方会员的努力,故而学会的大方向并未偏离,沦为纳粹政府在华宣传工具的说法被否定。

李雪涛2020年发表的《〈德国留学指导书〉(1937)之研究》也可视为中德学会的相关研究。该指导书由中德学会总务组1937年出版,目的在于介绍德国高等教育状况,为中国留德或者计划留德学子提供必要的留生活指引。在介绍了相关背景之后,该文叙述了中德学会为促进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所做的工作,随后对《德国留学指导书》的编译者张天麟进行了必要的介绍,再列出该书的目录结构,对重要章节例如留学线路、赴德费用、德国大学介绍和入学资格等进行分析。

叶隽所著《汉学家的中国碎影》实为自撰论文的合集,所收《简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日耳曼学与德国汉学的互动》述及中德学会德国汉学家与中国日耳曼学者的“二元设置”,

¹ 童欣:《中德学会是纳粹政府在华的宣传工具吗?——基于〈中德学志〉内容的分析》,载《德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7页。

提出了学会“中德二元互补”¹“双向在场”²的设计理念,比如卫德明—杨丙辰、谢礼士—董洗凡、谢礼士—冯至、傅吾康—杨丙辰、傅吾康—顾华等,认为中德双方学者的并驾齐驱和互通有无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³。该文再度揭橥了那个年代中国国内日耳曼学与德国汉学并驾齐驱式发展的特质,凸显了知识迁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不可小觑的作用:当时的德国汉学家同时以中国现代大学德文系师资的身份助推了中国日耳曼学术谱系的建立,而包括杨丙辰、冯至等一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德语学科开创者在内的中国学者,也与德国汉学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进而助推了德国汉学学科的发展。如果将更大范围的学人交游考虑进来,那么德国汉学界和中国日耳曼学界1949年前的知名学者几乎都能纳入这张中德学人关系网中⁴,互为彼此的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四、研究展望

从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窥见,国内外学界在中德学会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应该看到,不少早期论述还停留在介绍罗列和归纳总结的层面,虽然其资料价值自不待言,但缺乏剖析和探究的深度。可见,中德学会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在进一步钩沉发覆相关档案的基础上扩展和推进。这既包括学会的内部研究,比如人物、翻译和出版、德文夜校的开办、留德的促进和推广等;也涵盖学会的外部研究,比如学会成立与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学会在中德文化、教育和学术双向交流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等。

其一是学会的人物研究。不少既有研究都列出了学会21名中方董事的简表,但相关人等在学会中是否发挥了实际作用、做出了实际贡献,还是仅限于挂个荣誉名头,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挖掘;就董事们负笈海外的学缘而论,应该看到除了留德学人以外,还有一些董事具有留学英美的背景,这折射出不同目的国的现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留德派与留学英美派)之间的合作(当然也有竞争),甚至涉及德国和英美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制衡。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编译委员会的13名成员,除德国汉学家石坦安(Diether von den Steinen)之外,其余都是中国学人,但无一例外全都精通德语,有些也曾留学德国(比如张君勱、朱偰、贺麟、宗白华、吴伯藩、杨丙辰等),这些人的编译贡献可以置于德语书籍汉译史的背景下考察。除了中方人物以外,学会的德方人物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他们之间、以及与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汉学家之间经由各种因缘际会构建起来的学术和社会关系网络,尚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缺。比如就学术伉俪而言,以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傅吾康和胡隽因,对方志澍和马仪思、艾克与曾佑和的研究还有待推进。此外,王蒙的父亲、曾翻译过《今日德国教育》的王锦第与中德学会以及《研究与进步》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梳理,虽然王蒙在小说《活动变人形》里稍有提及⁵。除了这些名人,还有一些相对边缘的人物同样值得关注,毕竟学会会有123

¹ 叶隽:《汉学家的中国碎影》,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99页。

² 同上引,第100页。

³ 同上引,第106页。

⁴ 吴礼敬:《中德学人交往及知识、思想之迁移递嬗》,《中华读书报》2021年04月21日第8版。

⁵ [德]傅吾康著,欧阳翹译:《为中国着迷》,第97页脚注①。

名学会和 38 名会友¹。

其二是学会的出版物和藏书研究。首先，对《北平中德学会工作年报》的研究尚还不够，现在可见的年度报告横跨 1936 至 1941 年，记载了学会的运行和经营情况，但对其利用率尚还不高。2010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原藏于北京图书馆的 6 册《中德学志》重新编辑整理出版，为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史料。类似童欣对《中德学志》所做的深入研究值得继续推进。此外，学会编译出版的、包括各个学科领域（不仅局限于文学）在内的“中德文化丛书”也值得研究²，这当然可以跟前述对编译委员会成员的研究结合起来。举例来说，考虑到当时的北平正是世界汉学的中心³，收录了当时在北平的德国汉学家最新研究成果的三辑《汉学集刊》，可以说在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汉学史的长河里都别具学科史意义。此外，学会图书馆的藏书也值得研究，而学会编订出版的《中德学会德文图书目录》（1940）和《中文期刊有关德国论文索引》无疑提供了有益线索。除了《中德学志》，在当时的国际汉学中心北平还有另外一部稍早几年创刊的期刊——《华裔学志》落地生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同样值得进一步钩沉发覆。

其三是学会作为学术文化机构与当时二战大背景下的政治形势之间的复杂张力研究。中德学会为中国人发起成立倡议，但也得到德方的大力支持，董事会、总务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都有中德双方人士参加；后来学会又受到纳粹德国政府的资助，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一些纳粹当局的宣传任务；而在日伪统治北平期间实际上又受到日本当局的监管，尽管学会尽力与日本政府保持距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葛争斗在童欣的论文中已有涉及：比如中德学会及其附属机构乃至出版物的名称在中德文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对等，一般中文名称含有中德合作之意，而德文名称只字不提中方，仅仅显示其为德国机构；⁴ 另外，从《中德学志》刊名题写的变化可以窥见日本当局对学会潜在的控制和施压。⁵ 考虑到中德学会存在的大约 20 年间，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可谓波谲云诡、变幻莫测，1937 年 7 月的“七七事变”、1941 年 7 月纳粹德国承认汪伪政权而导致中德断交等历史大事都对学会影响甚大，这其中牵扯的中、德、日之间的复杂三边关系以及政治权力与学术文化的博弈有待进一步挖掘。

五、余论

中德学会以中国留德学人创建的个体组织起家，而后因为得到德国官方的支持而发展成为一个半官方的学术和文化机构，加之处于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其活动地点又是当时堪称世界汉学研究中心的北平，因此其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至于学会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可以说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一条“双向道”而非“单轨”，即德国的汉学研

¹ 丁建弘、李霞，《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交流》，第 282 页脚注②。

² 迄今仅能找到一篇相关成果，它简要论及了“中德文化丛书”在针对性、集中性和实践性上的三点突破，但区区一页半不到的篇幅很难让人将其界定为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参见仇妍：《浅论“中德文化丛书”诞生与突破》，载《今日科苑》2008 年第 2 期。

³ 顾钧：《曾经风流——汉学中心在北京》，载《读书》2014 年第 8 期，第 77-83 页。

⁴ 童欣：《中德学会是纳粹政府在华的宣传工具吗？》，第 112 页脚注③，第 115 页脚注④，第 116 页脚注④。

⁵ 同上引，第 116-117 页。

研究和中国的德国文化研究都从中受益匪浅。从本文对中德学会的国内外研究状况的梳理和评析可以看出,作为研究对象,中德学会既吸引了包括美、德、法等国在内的汉学家的关注,也逐渐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对该学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人物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出版物等的研究日渐增长。作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中德学会还留下了不少可以进一步扩展的研究空间,有待后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 Ding, J., Li, X. (1996). Deutschland-Institut und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Kulturbeziehungen. In M. Leutner (Ed.),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Studien zu den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pp. 307-328). LIT.
- Jansen, T. (1999). Einige Hinweise und Fragen zur Arbeit des Deutschland-Instituts in Peking 1933-1945. In Martin, H. & Hammer, C. (Eds.): *Chinawissenschaften –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pp. 185-201).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 Hu, C. (1987). A Note on the Deutschland-Institut at Peking 1931-1945. *Asien*, 25, 98-103.
- Kreissler, F. (1989).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https://doi.org/10.4000/books.editionsmslh.2125>
- Merker, P. (1999). Anmerkungen zum Wirken von Alfred Hoffmann am Deutschland-Institut in Peking, 1940-1945. In Martin, H. & Hammer, C. (Eds.): *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pp. 474-497).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 崔文龙. (2011). 中德学会的成立及相关争论. *民国档案*(03), 89-93.
- 崔文龙. (2012). 中德学会与德国对华文化外交. *史林*(06), 171-177.
- 丁建弘,李霞. (1998). 中德学会与中德文化交流. 载黄时鉴(编). *东西交流论谭*(页 265-289).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傅吾康. (2013). *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欧阳甦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著上下部分别出版于1995年和1999年)
- 顾钧. (2014). 曾经风流——汉学中心在北京. *读书*(08), 77-83.
- 柯伟林. (2006). *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4年)
- 李兴业,王淼. (2010). *中欧教育交流的发展*.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李雪涛. (2009). 此心安处即吾乡——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在中国的十三年(1937-1950), *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别册)4, 63-105; (2014). *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页 154-207). 新星出版社.
- 李雪涛. (2012). *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 德国汉学之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墨柯. (2005). 评霍福民 1940-1945 年在北京中德学会中的作用(李双志译). 载[德] 马汉茂等(编). *德国汉学: 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页 488-514). 大象出版社.
- 仇妍. (2008). 浅论“中德文化丛书”诞生与突破. *今日科苑*(02), 209-210.
- 沈福伟. (2003). *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童欣. (2013). 中德学会是纳粹政府在华的宣传工具吗?——基于《中德学志》内容的分析. *德国研究*(4), 112-122.
- 田正平. (2004). *中外教育交流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吴礼敬. (2021). 中德学人交往及知识、思想之迁移递嬗. *中华读书报*, 4月21日第8版.
- 叶隼. (2020). *汉学家的中国碎影*. 福建教育出版社.
- 托马斯·詹森. (2005). 对北京中德学会在 1933-1945 年间所从事工作的几点说明与质疑(刘梅译). 载[德]马汉茂等(编). *德国汉学: 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页 176-193). 大象出版社.
- 张国刚. (1994). *德国的汉学研究*. 中华书局.
- 张西平. (2005). *传教士汉学研究*. 大象出版社.